



经学简史

何耿鏊 编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经学简史

何耿镛 编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闽] 新登字 09 号

责任编辑：王依民

封面设计：林 松

经 学 简 史

何耿镛 编著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尤溪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8.75 印张 1 插页 216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5615—0837—9/K·143

定价：6.00 元

序

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以来，儒家经学在我国学术史上经常居于统治地位。不过，经学本身有其盛衰转折的历史，如两汉为经学兴盛时期，魏晋时则玄学兴起，经学衰落，此为一变。隋唐时，在统一局面下，南北经学复合于一，孔颖达等纂辑《五经正义》，成为学校、科举考试的统一教材，此又一变。中唐以来，多倡儒道佛三教一家之说，演变至于两宋，理学勃兴，大讲所谓正心诚意、身心性命之学，至明代而王阳明大倡心学，此又一变。明末清初，宋学特别是心学日益流于空虚，至清代时汉学又盛极一时，此又一变。经学多变，于此略见一斑。

抑且经学中有今文与古文之争。西汉为今文经学的全盛时代，当时十四博士，尽为今文学者。及至哀帝时，刘歆移书太常博士，欲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今尚书》等古文经于学官，受到坚强的反对而止。不久，刘歆辅佐新朝，古文诸经因皆得立于学官。光武重兴汉室，故东汉学官犹重今文，而古文经学在社会上广为流布，特别是郑玄遍注《五经》，糅合今古文于一炉，故实际上东汉时是古文经学取代了今文经学。永嘉之乱，经籍散失，致有梅赜所上的伪《古文尚书》，因此，古文经中又有真伪古文之别。唐代所纂《五经正义》，实糅合今、古及伪古文说的大杂脍。至于宋儒，又怀疑经先河，驯至清代，今文经学再兴。由于清初文字狱的高压政策，学者唯有消磨其精力于文字训诂、名物

考据之中，失此得彼，于是伪《古文尚书》之伪，得以确证无疑，而今文经学大盛。迄于清末，康、梁即以今文经说为变法理论依据。而古文经学亦不乏其人，章太炎即以古文经说以攻维新派而主张革命者。今古文经学之争，且延及于辛亥革命之后。

经学的盛衰转变与今古文经学之争，有其学术上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又与世之盛衰、政治上的对立斗争常相联系。特别由于经学在学术上的统治地位，其触角遍及于历史上的哲学思想、文学创作、音乐、礼仪、政法制度、宫城建筑、乃至天文、地理，几乎无不有其影响或烙印。因此，研究中国历史，探讨我国过去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等，莫不与经学息息相关。然则我国经学的历史，既是整个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又为了解我国历史、了解我国前天和昨天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或专门的手段。可惜，国内缺乏运用唯物史观来阐述的贯串古今的经学史。何耿镛教授研究经学多年，从而写成这部《经学简史》，研究经学的源流衍变，探赜发微，多所创获，岂止补苴罅漏而已，其嘉惠于学者固未可量也。余拜读之，诚如空谷足音，不自觉其颺然而喜，故乐而为之序。壬申年季春韩国磐志于鼓浪屿老榕书屋。

目 录

序	(1)
壹. 经学的性质和基本内容	(1)
(一) 从六经到十三经	(3)
(二) 孔子与六经	(7)
(三) 十三经述评	(10)
(四) “六经皆史”说	(64)
(五) 儒学的确立和演变	(69)
(1) 儒学的创建	(69)
(2) 孔子之后儒学的分化	(73)
(3) 儒学的神学化	(76)
(4) 儒学的玄学化	(78)
(5) 儒学的哲理化	(79)
(六) 儒学? 儒教?	(86)
贰.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	(93)
叁. 两汉经学	(104)
(一) 今文经学独尊地位的确立	(104)
(二) 董仲舒与《公羊春秋》	(112)
(三) 古文经学的兴起和发展	(119)
(四) 白虎观会议和《白虎通义》	(124)
(五) 经学与阴阳五行	(129)

(六) 经学与谶纬·····	(138)
(七) 郑玄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及两汉经学的终结·····	(143)
肆. 魏晋南北朝经学·····	(161)
(一) 郑(玄)学与王(肃)学之争及其政治背景·····	(162)
(二) 王弼以《老》解《易》及其他各派经学·····	(166)
(三) 伪孔传古文《尚书》的出现·····	(169)
(四) 南北朝的经学·····	(170)
伍. 唐代经学·····	(177)
陆. 宋学·····	(185)
(一) 什么是宋学? ·····	(185)
(二) 宋学兴起的原因·····	(192)
(三) 宋代经学之一斑·····	(193)
柒. 元明经学·····	(213)
捌. 清代经学·····	(226)
(一) 清代古文经学的发端·····	(226)
(二) 清代古文经学之兴盛·····	(232)
(三) 清代今文经学复起之先声·····	(237)
(四) 康有为与今文经学·····	(239)
玖. 结语·····	(264)

壹. 经学的性质和基本内容

在历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作为封建文化的核心，是儒家经学；作为封建统治者法定的指导思想，是以经学为基本内容的儒家思想。

一般的说，经学就是儒学。不过，儒学的创立始于孔子，而儒家典籍被尊为“经”，则是汉代的事情，况且阐发儒家思想的书籍也不完全限于十三经。因此，所谓经学，严格说来是儒学的主体或核心，有的人把它叫作儒学的“制高点”。

今天，人们谈到经学，总以为它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学问。然而，从经学的产生和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认识并不全面。就总体而言，以经学为基本内容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居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和延续其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经学与整个封建制度的命脉血肉相关。从汉代到清末，经学的盛衰，经学领域的斗争，几乎都与社会政治因素联系在一起。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对立和斗争，有它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魏晋时期王（肃）学与郑（玄）之争，表面上是经学之争，实质上反映了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矛盾；宋代出现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理学，也是为内忧外患的赵宋王朝强化中央集权专制统治而产生的一种经学哲学，宋神宗时期出现的所谓道学与新学之争，也不单纯是学术之争，而是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直到清末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也抬出孔子作招牌，打着经学的旗号，以

孔子和经学作为宣传维新变法的护身符。总之，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以及社会政治制度或政治设施的变革，都与经学有一定的联系。所以从政治的角度看，一部经学史实质上是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斗争史，主线是政治思想斗争史，甚至是政治斗争史。从文化学术的角度看，中国封建社会的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都以经学为重要准则和基本内容；经学与哲学、史学、伦理学、语文学、文献学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经学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又有它的重要地位。周予同先生在皮锡瑞《经学历史》注本序中指出：“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以立，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以成”，这就概括地说明了经学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学术的关系。今天我们如果脱离现实去“皓首穷经”，做个学究，那当然是错误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要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史，文化学术史；要研究中国的哲学、史学、伦理学、语文学、文献学，要研究中国儒学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影响，就必须了解经学，研究经学的历史发展。

中国经学，盛行于两汉。“经学”之名，也出现于汉代。《汉书·儒林传》说孔子之教化遗於鲁，“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又说“欧阳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宽。宽又受业孔安国，至御史大夫，自有传。宽有俊才，初见武帝语经学。”从西汉到清末的两千多年间，经学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著录，经部书籍已达1773部，20427卷。^①关于经学历史的著述，主要有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现代学者如范文澜先生，周予同先生等对经学史有精深的研究，范文澜先生著有《经学史讲演录》（《新化月报》1979年6月），周予同先生的经学史论著主要见於朱维铮先生编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除此之外，与经学有关，对经学

研究有历史资料价值的著作，大致可分为三类：(1) 以经师为中心的，如胡秉虔的《西京博士考》、张金吾的《两汉五经博士考》、王国维的《汉魏博士考》、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以及各史书的“儒林传”或“儒学传”等，但这类著作多为断代记载，不能看出经学发展的趋势，且偏重于个人情况，而看不出某一时期总的情况。(2) 以书籍为中心的，如朱彝尊的《经义考》、翁方纲的《经义考补正》、郑樵的《通志·艺文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经部”以及各史的“艺文志”或“经籍志”等，这类著作虽不限于断代，但仍不能从中看出经学发展的总趋势。(3) 以典章制度为中心的，如顾炎武的《石经考》、万斯同的《石经考》、杭世骏的《石经考异》等都属这一类。在古代，选举、学校与经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通典》的“选举门”、《通志》的“选举略”、《文献通考》的“选举考”和“学校考”也属于这一类。但这一类著作往往是罗列若干史料，加以排比，而不能显示出典章制度在经学上的前因后果和彼此相互关系。总之，以上三类书籍只能作为辅助的或分门的研究参考资料，要想对中国经学的历史发展作系统的科学总结，有等于现代专家们以新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撰写一部新的经学史。

(一) 从六经到十三经

儒家的经书，最初只有六种，叫六经（亦称六艺）。这六种经书是：《易》、《诗》、《书》、《礼》、《乐》、《春秋》。《乐》今不存，《宋书·乐志》说“秦废典籍，乐经用亡”，实际上只有《易》、《诗》、《书》、《礼》、《春秋》五经，所以西汉武帝时只立五经博士。

然而，被儒家尊为“经”的这些书，为什么叫“经”？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班固在《白虎通义·五经》中说：“经，所以有

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或当删定六经之时，以其道可常行，正名为经。”孔广林说：“北方戎马，不能屏视月之儒；南国浮屠，不能改经天之义。”②所谓“经天之义”，是说六经大义，如日之经天，可以叫“经”。《说文解字》：“经，织也。”段注：“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这些说法，都未免穿凿附会，而且把儒家经典神圣化了。所以，范文澜先生说：“为什么叫经，是无法说清楚的。”③

“经”字最早见于周代铜器铭文，最初字形写作“𡩺”，“𡩺”象加在“壬”上的纵丝（“壬”象纺织工具或工具部件；一说为机中持经者），也就是“经”的本字。后来人们不了解“𡩺”就是表示“经丝”（纵丝）之形象，又加上“纟”作表意范畴的形符（形旁），成为“经”字（形声字，“𡩺”作“经”之声旁）。“经”作为典籍解释，到战国之后才出现，而且那时被称为“经”的，并不限于儒家经典。《庄子·天下篇》说：“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庄子是战国时人，他把墨子著作也称为“经”。把儒家典籍称为“经”，始见于《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从此之后，“经”就往往专指儒家经典。把儒家典籍称为“经”之后，似乎就带有“神圣”的意味。实则不然，临沂出土的汉简中，还有《相狗经》（十一枚），可见称“经”本是极平常的事。被封建统治者尊为经的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本来都是极平常的书。如《周易》本是卜筮书，可是到了儒家手里就变得很神圣了；说什么伏羲“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以画八卦，建五气，以立五常之行象；法

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度时制宜，作为罔罟，以佃以渔，以贍民用，於是人民乃治，君亲以尊，臣子以顺，群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④《春秋》不过是鲁国的编年史，可是儒家却借《春秋》宣扬孔子的《春秋》笔法和大义微言，说孔子作《春秋》，是因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其目的是诛讨乱贼，以戒后世，其治世之法，垂于万世。《诗经》本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也包括一部分民歌，儒家把它尊为“经”，宣扬“温柔敦厚”的所谓诗教。又如《尔雅》，本为一部故训汇编（实际上是一部词典），古代儒生们把它作为解经的工具，通经的阶梯，所以也被尊为“经”。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儒家所谓神圣的经典，只不过是把古代普通的历史文献或书籍，按照儒家的政治思想、伦理观念，道德准则去加以解释，引申和发挥，并使之理论化、神圣化，以作为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工具。封建统治者把六经说成是“治世之道”，“六经是万世教科书”。他们之所以如此尊崇六经，那是因为六经的内容，经过儒家的改造、发挥之后，直接成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维护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精神工具；从另一方面说，他们又认为提倡六经、宣扬六经，可以按照统治阶级的愿望，去感化人的思想感情，树立符合儒家规范的社会道德风尚。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⑤但是，推行六经教化，是否就能起到这些作用呢？就是在《礼记·经解》中也指出了六经教化的弊病。《礼记·经解》说：“《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郑注：“《诗》敦厚，近愚；《书》知远，近诬；《易》精微，爱恶相攻，远近相取，则不能容人，近于伤害；《春秋》习战

争之事，近乱。”汉代提倡“以孝治天下”，所以到了东汉，五经之外，又增加了《孝经》和《论语》，合为七经；唐代以《易》、《诗》、《书》、《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为九经，并以九经取义。九经之中，又依据经文字数的多少分为大中小三等。《左传》、《礼记》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在大经中，《左传》字数多于《礼记》，所以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多习《礼记》，不习《左传》；在中小经中，《周礼》、《仪礼》、《公羊》、《谷梁》难于《易》、《书》、《诗》，故多习《易》、《书》、《诗》，不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当时任国子祭酒的杨珣奏言：“今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二三……又《周礼》、《仪礼》、《公羊》、《谷梁》殆将绝废……请量加优奖。”^⑧据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唐文宗太和年间，复刻“十二经，立石国学”。这十二经是：《易经》、《书经》、《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谷梁》、《论语》、《孝经》、《尔雅》。

宋代理学家把《孟子》地位抬高，朱熹取《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相配，称为《四书》，自作“集注”，于是《孟子》进入了“经”的行列。唐代的十二经加上《孟子》，就成为十三经。

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其注疏者如下：

《周易》 魏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 旧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诗经》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左传》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公羊传》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

《谷梁传》 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经》 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 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二) 孔子与六经

按照传统的说法，孔子删定六经。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他认为：《易》自伏羲画卦、文王重卦，有画而无辞，止为卜筮之用而已，自孔子作卦爻辞、彖、象、文言，阐发羲、文之旨，方成为经。《春秋》为鲁史旧名，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自孔子加笔削褒贬，为后王立法，方成为经；《仪礼》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诗》《书》经孔子删定才有义可为法戒而列之於经。^⑦皮氏的说法，反映了经今文学派的观点。今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素王），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删定六经，或用以教人，或寄托其改制主张，或借以谈论哲理，因而认为孔子是教育家、政治家、哲学家；他们认为六经，尤其是《易》与《春秋》，是孔子明道经世之作，因而强调经书的“大义微言”，而不甚重视其史料价值。

经古文学派则从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六经只是周公的旧典，^⑧先王的典章制度和历史文献。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圣人，他不过是将前代的史料加以商订整理，以传之后人而已。他们把孔子看作是史学家，看作是古代文献的保存者和传播者，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所以有它的传统和连续性，实在是因为有详密而不绝的史籍的缘故，而孔子则是古代史籍“继往开

来”的集大成者。

关于孔子和六经的关系，经学史上大体有以上两种说法。可是，“五四”时期以呐喊“打倒孔家店”著名的《新青年》的一些干将（以钱玄同为代表）都断然否定关于孔子和六经关系的传统说法。钱玄同说：“不把六经与孔丘分家，则‘孔教’总不容易打倒。”^⑨于是他怀疑孔子没有删述过或创作过六经，他怀疑现存五经本是战国末才配成的互不相干的五部书，尤其怀疑历代学者同声断定为孔子写定的《春秋》绝非孔子所作，如此等等，在客观上否定了经今古文学关于孔子著述的一切旧说。他的话尽管失之偏激，但却为研究者摆脱传统偏见，提供了启迪。

现代有的学者认为：“经古文学家以史学眼光看待六经与孔子，经今文学家则以政治哲学眼光看待六经与孔子，难怪得出的结论大不相同。可是两种说法都有它对的一面。说六经只是‘周公旧典’，说孔子只是抱残守缺，补苴掇拾，那是古文学家之蔽；说六经主要是孔子制作，前所无承，那又是今文学家的偏见了。我们认为所谓‘述而不作’，乃明其有所依据，并非一仍旧贯，抱残守缺的意思。这样，赋新理想于旧事物，或托古人以立言，课徒授学之暇，加以补订删定，正是意中事。孟子、司马迁以来相传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等工作，不是没有根据的。”^⑩

杨伯峻先生根据《论语》中有关孔子与六经关系的材料，指出“孔子自己说他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庄子·天运篇）。从《论语》看，他经常谈《诗》。《诗》就是今天的《诗经》，是古代的诗歌总集，有庙堂之诗，有卿大夫之诗，有民歌。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叶。孔子曾经整理过《诗》，见《论语·子罕篇》。《书》是《尚书》，又称《书经》，是古代历史资料汇编，孔子曾引用它，见《论语·为政篇》。《礼》，孔子的时代或许书，但现今流传的《礼》，即《仪礼》，则出自孔子的讲授。

《乐》只是曲谱，早已亡佚，但孔子不仅是音乐爱好者，很可能十分内行。《易》，也叫《周易》或《易经》，当孔子时，只有卦辞、爻辞作占筮用，孔子曾经引用它。《春秋》是鲁国史书，孔子曾采用它作近代史和当代史的教本。孔子整理和传授古代文献的情形大概如此。^⑩孔子与六经的关系究竟如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我们应该肯定，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有它的崇高地位。他是开创私人讲学的第一个人，也是传播古代文化的第一个人。中国古代文化的流传以至后来的扩大和发展，不能不归功于孔子。

由于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者，而六经又被说成是孔子删定，所以在儒家学说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儒家学派以及同一时期不同观点的儒家学派都抬出孔子作为祖师爷，都认为他是得孔子学说的真传，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实际上都是抬出孔子作招牌而依据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宣传各自的思想学说，挂孔子的羊头，卖自己的狗肉，因此孔子的形象在历史上就变幻不定。他时而现身为先知，时而现身为巫师；或者被尊为“素王”，或者被说成安贫乐道的先师；他被一些人看成是禁欲主义者，被另一些人看成是享乐主义者；他有时被看成是君主专制的拥护者，有时则被看成是限制君权的首创者；清末康有为为了宣传维新变法，强调孔子“托古改制”，塑造了一个主张变法改制，倡导革新的孔子；章太炎为了对抗康有为，又塑造了一个“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则可”的醉心于富贵利禄的孔子。正如梁启超所说，孔子渐渐地变为董仲舒、何休，渐渐地变为马融、郑玄，渐渐地变为韩愈、欧阳修，渐渐地变为程颐、朱熹，渐渐地变为陆九渊、王守仁，渐渐地变为顾炎武、戴震。^⑪我们还可以说渐渐地变为康有为、章炳麟等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道统”“学统”之类的传统观念在作怪，致使拿个人的主观的孔子去代替真正客观的孔子。他们都是实用主义者，把历史看作是达到某种现实目的的手段。这就是孔子的历史命运。今天，如何

运用可靠的资料，历史地、客观地研究孔子，还孔子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研究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研究原始儒学与儒学发展的内在联系，就成为儒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三) 十三经述评

按(1)《易经》又名《周易》，本来是一部卜筮书（以龟甲为卜，以蓍草为筮），后来成为儒家经典，变成一部讲哲理的书。汉代以《易》为六经之首，《汉书·艺文志》称《易》为“六艺之原”。

《易经》有两个基本符号：——。“—”代表阳，“--”代表阴；“—”为阳爻，“--”为阴爻，叫爻画。由这两个符号连成三叠而成八卦：乾 ☰、坤 ☷、震 ☳、巽 ☴、坎 ☵、离 ☲、艮 ☶、兑 ☱。

按《易传》的说法，八卦分为阴阳两类。乾、震、坎、艮为阳卦，坤、巽、离、兑为阴卦。乾是三阳爻组成，为纯阳之卦；坤是三阴爻组成，为纯阴之卦；震、坎、艮三卦皆一阳爻两阴爻组成，而其爻画皆为五，为奇数，亦为阳卦；巽、离、兑三卦皆一阴爻两阳爻组成，而其数皆为四，为偶数，故此三卦亦为阴卦。八卦不仅表示阴阳两大类的事物，实际上其象征意义可以是无穷的。按照古代的说法，八卦是包羲氏“观象於天，观法於地”而制作的，所以它的卦象首先就象征了自然界的八个方面：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这是在《左传》《国语》所看到的八卦的基本象征意义。但是，《易传》又依据八卦的基本卦象加以引申而象征其他意义。如：